

非常视点 以新改变回应 “诗和远方”新期待

付彪

加长版“小长假”已经结束。不同于以往“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预约不出游”成为今年“五一”旅游的新亮点。在“预约制”渐成常态的趋势下，如何让游客“来之能游、游之能乐、乐之能返”，实现旅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游客和从业者的共同期待。

今年“五一”假期，疫情尚未结束，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各地采取许多新的管理措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节前就联合发布相关通知，要求景区建立完善预约制度，合理控制流量，确保安全有序运行。

为此，各地景区每日公布预约数额，如故宫每天限额5000人、九寨沟每天限额1万人、黄山每天限额1.5万人……通过预约可以有效控制游客流量，引导游客错峰旅游，避免游客扎堆、聚集现象，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旅游体验。诚如在北京一些热门景区，游客忍不住点赞景区“预约制”的实效——“山和花海代替了人山人海”“童年记忆中的北海公园回来了”。

同时，按照“实名预约制”“只开放室外区域”和“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30%”等要求，多地景区将流量管控的关口前移，变被动的现场分流为主动的行前计划和引导，也为景区秩序带来新变。

疫情防控倒逼“预约制”渐成景区标配，但“限流30%”的红线之下仍存在一些矛盾亟待破解。比如，尽管泰山景区在5月1日执行了接待量不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30%的要求，依然没能避免局部拥挤情况发生。业内认为，景区内出现的“冷热不均”现象，与局部导流不到位、重要节点的管理存在短板有关。那么，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在限制人流、提振消费、优化体验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让游客来之能游、游之能乐、乐之能返？笔者认为，根本出路还是创新，以新改变回应游客“诗和远方”新期待。

这场疫情已让不少景区将“歇业期”变为磨练内功的“黄金期”，并在这次假期中得到了检验，为更多景区提质升级提供了借鉴，其中包含理念思路、运营模式、技术手段等创新。“预约制”既是景区控流的有效手段，也是拓展景区全方位创新的载体。景区应兼顾经济、安全和体验，更精细、更柔性地运用市场和技术手段，通过优化线路组合、丰富游览项目、及时信息触达、实时引流错峰等措施，提升公众旅游体验。

对“90后包租婆”炒作 别一笑了之

常德

近日，一位27岁的广州女子号称拥有超过“400栋楼”的相关短视频在社交网络上不断热传。视频里，该女子号称有“400栋”房产，每日过着收租的生活。走红之后，该女子包租婆身份背后资产真实性却引发网友质疑。5月4日，女子通过“包租婆D姐”的账号直播回应网络上的种种质疑，称关于其拥有“400栋楼”“每栋楼月赚50万”“身价超2亿”等言论皆不实，自己只不过是承租再转租的方式经营公寓租赁。

年轻的90后，在广州市拥有400栋楼，这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正如有网友质疑，广州在2017年即限购，这位“90后包租婆”就算有钱，又怎么能拥有400栋楼的产业？面对质疑，这名女子回应称此前说的拥有“400栋楼”“每栋楼月赚50万”“身价超2亿”等言论皆不实，她之所以在直播中“吹嘘”自己拥有400栋楼，是为了炒作自己，通过直播带房。现在她意外走红，应该正合她意，她自己坦言，“如果自己因此有了流量，希望可以转化为承租率。”

实际情况是，400栋楼“大部分是租的”，每栋楼赚的租金也不是先前所称的“月赚50万”，而变成了“房子盈利情况不等，有的月赚几千、几万甚至赔钱的也有”。舆论对于这起事件的关注，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女子这么年轻，凭自身努力成了亿万富婆，这自然令人艳羡，也令人称奇。公众的关注并没有问题，不能与拜金、享乐等心理扯上关系，问题出在这名女子的恶意炒作。

互联网时代是流量时代，是眼球经济时代，通过炒作、恶俗营销等，来获取流量，获得关注，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且较为常见。这种现象扰乱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误导了广大网友，还可能传播“负能量”，传播消极价值观，影响社会风气。对于这种恶意炒作，就不能一笑了之，而要一查到底。

比如在广州这起事件中，那名“90后包租婆”，有明显的炒作嫌疑，她的言行涉嫌造谣，误导了广大网友，让不少人信以为真，而她的回应却并没有丝毫歉意。对此，就需要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如果该名女子及其背后团队涉嫌恶意营销，就要依法依规予以惩治，这样才能以儆效尤，有利于净化网络舆论环境，维护好网络舆论空间。

管好社区大件垃圾重在制度创新

本报特约评论员

今日社评

为推进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落实，北京市生活垃圾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部日前开展首次现场督导检查。督导检查发现，部分小区存在桶站设置不规范、垃圾桶不洁、标识更新不到位、厨余垃圾分类质量差，垃圾投放现场缺乏指导，大件家具暂存和回收点位未到位等多方面问题，其中大件垃圾管理存在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大件垃圾收集和利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规定，大件垃圾是指重量超过5公斤，或体积大于0.2立方米，或长度超过1米，整体性强、需要拆解后再利用或处理的废弃物，包括废家用电器和家具等。北京市生活垃圾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部督导检查发现，在个别小区，儿童自行车、泡沫、手拉车等大件垃圾“藏”在小区宣传栏后侧，有的小区垃圾桶旁堆放大件垃圾等。管理大件垃圾已成为一道现实考题，尤其是在开展垃圾分类的大背景下，答好这道考题颇为迫切。

对于大件垃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带队督查的北京市副市长张黎明提出，小区要建立大件垃圾暂存处，使大件垃圾

大件垃圾管理是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一环，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做好社区大件垃圾管理工作，可为垃圾分类工作赋能增色，倡导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此需要加强制度创新，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引导广大居民严格按照规定要求，规范投放大件垃圾，助力垃圾分类工作顺利推行，共建和谐美丽家园。

无处存放。北京在正式推行垃圾分类之初，就着手解决大件垃圾暂存、清运等问题，足见这是垃圾分类工作的一环，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

居民小区建立大件垃圾暂存处后，需要解决一些居民“随时扔”的问题，避免由此产生的社区大件垃圾清运难、成本高等矛盾。相对厨余等生活垃圾而言，居民投放大件垃圾既不急迫，也不频繁。上海市去年发布《关于规范本市大件垃圾管理的若干意见》提出，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或者乡镇、街道可选择在卫生月、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适宜时间，探索开展大件垃圾集中投放活动，

集中投放日当天对大件垃圾实行集中、免费清运。该《意见》实施以来，这方面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管好大件垃圾重在制度创新。北京市不妨借鉴上海的做法，研究制定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规定设立大件垃圾抛弃集中投放日，要求居民严格按时投放大件垃圾；引进再生资源企业，有偿上门收集大件垃圾等。

旧家具、旧家电不等于废家具、废家电，不少大件垃圾其实是因居民“更新换代”而被淘汰，他人“拿来”可直接使用，有的稍经清洗维修后就能重新焕发生机。从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建立实施社区大件垃圾再利用

机制，为有利用价值的大件垃圾找到新主人，对于那些能够继续使用的大件垃圾，主人送入“暂存点”时可一并附上说明书。又如，大件垃圾集中清运前，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组织社区公益组织、社区志愿者到大件垃圾暂存点，对大件垃圾进行甄别判断，找出其中仍有使用价值的大件物品。对有瑕疵的旧家具、旧家电等大件物品进行维修后，赠送给贫困人士或者处理给其他有需要的居民。

为提高居民分类积极性，从源头上减少大件垃圾量，各社区还可利用节假日时间，举办社区跳蚤市场，组织开展“大件物品处理日”活动，发动广大居民将拟抛弃但有利用价值的旧家具、旧家电等物品转让给需要的人。日常管理中，社区还可利用公告栏、业主微信群等载体发布转让信息，便于有需要的人“闻讯而至”，实现大件物品再利用。

做好社区大件垃圾管理工作，可为垃圾分类工作赋能增色，又能促进节能环保，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倡导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此需要加强制度创新，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构建奖惩并举机制，引导广大居民严格按照规定要求，规范投放大件垃圾，助力垃圾分类工作顺利推行，共建和谐美丽家园。

纵深话题

各地物业管理立法不妨互相借鉴

张海燕

以北京为例，过去10年主要依靠《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来规范小区物业管理工作。虽然该办法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的主要求和社会发展。5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从“办法”升级为“条例”，制度内容也有多项突破，如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增加了突发事件下物业落实应急措施责任，值得称道。

再比如，新修订的《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相比原条例都进步不少。深圳《条例》要求加强对业主共有资金、专项维修资金的监管，修改业主大会生效和表决门槛，降低业委会选举门槛，并强化对业委会的监督。这是针对深圳物业管理暴露的新问题量身定制的新药方，有望让物业管理回归健康状态。

也就是说，无论是新施行的地方物业管理条例，还是正在立法的地方条例，都是以各地物业管理问题为导向对原制度进行完善，这体现出立法者正视问题、顺应民意的立法态度。在此基础上，各地可以借鉴其他地方立法亮点，因为各地物业管理既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互相借鉴可提升立法效率和质量。

如北京现有10213个住宅小区，其中仅有1216个小区成立了业委会，业委会成立率明显偏低。所以，《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创新性提出，可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来组织业主共同决定物业管理事项。这有利于解决业委会成立率低的难题。其他业委会成立率偏低的城市，不妨借鉴北京的这种创新。

实际上，电梯坏了没人修、违法搭建

无人管、消防通道被占用这类老问题，不是某个地方“特色”，而是共性问题。如何解决物业管理中的共性问题，各地在立法中都在探索，其中有的地方摸索的办法更有效，对其他地方而言就是现成的良策，直接借鉴比苦苦摸索更明智。要指出的是，物业管理以自治为主，充分征求民意才能立好法。

除了立法需要互相借鉴，落实法规同样需要互相借鉴。长期以来，由于居民小区属于业主自治范畴，行政管理很少介入，这就造成业主自治不力，而行政管理又缺位。虽然有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和地方物业管理制度，但落实效果都不大理想。因此，明确各方责任应成为立法重点，强化责任落实才能避免物业管理法规沦为“纸规”。

警惕“表演式签约”影响宏观经济决策

谭浩俊

不能为了一时之需，做出数字造假和掺加水分的行为。

将一个项目多次签约、反复签约，实际上就是数据造假和政绩造假。一些地方复工复产压力较大，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较多的地方，复工复产的难度更大，但都不是数据造假的理由。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才能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宏观经济决策是依据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来作出的，只有提供准确、可靠、客观的数据，宏观经济决策才能科学、合理、有效，才能符合经济发展现状、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否则，就有可能对宏观经济决策形成误导、产生干扰，导致决策不科学、不合理、不客观，形成与实际存在较大差异的现象。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最大限度减少疫情的影响，加快经济的恢复步伐，推动项目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做好这些工作，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而不能玩数字游戏，否则就有可能对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使宏观经济决策产生失误。

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全球供应链几乎瘫痪，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经济复苏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经济更需要各项数据的绝对准确可靠，不能带任何水分、不能有任何泡沫。中央反复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说到底就是担心地方注水分、吹泡沫。这样很不利于决策层科学决策、统筹考虑、全面规划，容易出决策失误。

疫后经济纾困出现的形式主义，容易

与疫情形成叠加，其危害不可小视。复工复产作为防疫后半场，理应与防疫保持连续性，将防疫期间求真务实的做法延续到这一阶段，既要通过考核监督等方式给予一定压力，不能让干好干坏一个样，更要确保数据和签约的真实性，不能给造假者留下任何空间。如此方能在最大限度控制疫情之下，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正因为如此，面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项目重复签约、表演式签约、数据式签约，有关方面应当建立核查和监督机制，切不要地方怎么上报数据，就一切按照地方的数据统计和汇总。要通过监督检查，斩断地方编造政绩、添加水分的黑手，让数据更加真实可靠，让决策更加科学理性。对造假严重的地方，要严厉追究地方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一种说法

对网游充值打赏立规迫在眉睫

胡欣红



实际情况看，常常要面临举证难、维权难乃至投诉无门之类的问题，追讨成功的比例似乎并不高。因此，游戏平台能主动联系学生家长，并核实协商同意退还70%的费用，确实值得点赞。

不过，相比事后后的积极回应，更重要的是亡羊补牢，通过确立相关规范切实杜绝这种“疯狂”的充值打赏行为。

“熊孩子”败家充值打赏事件一再发生，家长固然要监管好自己的账户和小孩，而作为受益者的相关平台，更不能无动于衷。比如，在青少年模式和支付认证等环节，就应该严格遵循规定，强化“防火墙”功能。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不少平台却出于利益考量，玩起了“花招”。

前不久，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

报告称，部分直播平台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斗鱼、虎牙、抖音等平台，可通过输入密码延长使用时间。在充值环节，斗鱼和酷狗规定，“对于未成年用户使用本服务过程中的行为，以及因使用本服务产生的一切后果不承担责任”。奥特曼传奇英雄，以未满十岁未成年人身份信息注册，体验员连续充值5次，金额从6元至258元不等，不受限制……一路“绿灯”，“熊孩子”们岂能不乘虚而入？

除了落实基本的规范之外，平台在支付认证上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对于明显异常的大额充值打赏或者连续充值打赏，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和提醒机制。诚如评论者所言，平台在充值打赏的制度设计上，应着眼于普通人的理性选择，而不是落脚于“土豪随意”，这也是一个正规的平台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

防范孩子沉迷网络和败家充值打赏，当然不能仅仅停留于技术层面。但如果充值打赏立好了规则并有效落实，“熊孩子”还能轻易“疯狂”吗？

漫画/陈彬



下载北京头条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